

ZHEXUE FANSHI ZHUANHUA YU
MAKESI ZHUYI ZHEXUE LILUN CHUANGXIN

哲学范式转换与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

张艳涛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ZHUXUE FANSHI ZHUANHUAN YU
MAOXISI ZHUYI ZHUXUE LILUN CHUANGXIN

哲学范式转换与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

张艳涛 著



责任编辑:曹歌 刘江波

封面设计:汪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范式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张艳涛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01-015011-6

I. ①哲…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9000 号

哲学范式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

ZHEXUE FANSI ZHUANHUAN YU MAKESI ZHUYI ZHEXUE LILUN CHUANGXIN

张艳涛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5

字数:230 千字

ISBN 978-7-01-015011-6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言

任教于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艳涛副教授今年4月来中国台湾，在南港“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透过我早期授教的两位学生黄瑞祺研究员与黄之栋助理教授之介绍，他特地跑到辅仁大学哲学系来与我相识。两人相见如故、畅谈甚欢。他为人的诚恳、学问的渊博和处事的明快，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勾起我近30年前在中国大陆讲学（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回忆与思念。当年应北京大学哲学系前系主任黄枬森教授（1921—2013）的邀请，我在1987、1988、1989和1991年前后四度前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大学讲学，结识了郑杭生、曹玉文、张翼星、徐崇温、杜章智、陈志尚等前辈马克思主义教研者，接受他们的指教，也与当时中壮辈的学者如俞吾金、王守常、赵常林、余文烈、陈学明、衣俊卿等相互切磋，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高峰。

1992年我离开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返回乡土的台湾，先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两年，再转任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正式编制的教授（一度荣获连震东先生纪念基金会社科经讲座教授）先后20余年。在台湾大学延退10年后，2012年被位于新竹市的台湾交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特聘为该中心有史以来唯一的讲座教授（为期3年），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国际政治、欧洲文化和当代思潮等课程。此外，回台22年间先后在辅仁大学、淡江大学、东吴大学和东海大学兼课，现仍在体育大学体

研所教授近 20 名博士生，在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 90 余名大学生，这都是兼职的讲学情况。

为了让台湾地区的学生认识与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研的进程，我特别商请张艳涛副教授的同意，让他报告他的专业，亦即改革开放 35 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发展与创新的情形。张教授不辞辛苦奔走于南港、新庄、林口与新竹之间，为我的博、硕士生和一般大学生作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介绍，我们师生在受益之余，对他的劳苦更为感佩。

张教授曾交给我他最近完稿的新著：《哲学范式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要我替他这部新著写篇序言，我欣然同意。在两周的细读与欣赏之余，发现此书不但能够抓住中国这 35 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势头与流程，更能把握精神、理念、哲学、理论的真髓，是一本极富创意和启发新知的学术杰作。

首先，他采用美国科学史学家和方法论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所提出的特定科学界共同承认、接受、信奉的学说及其操作程序的“范式”（paradigm 台湾译为“典范”）和“范式转换”两个概念，将之应用到哲学理论之上，然后以这组概念来分析改革开放 35 年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演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历程，诠释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涵与形式。

依据他的看法，这 30 余年来中国哲学界在多元语境中，呈现了三个（研究、表达和思想）不同的范式及其转换。这一章被作者当成导论来充作启开全书的钥匙，并让读者顺势进入富丽堂皇的学术宫殿。

其次，张教授详细剖析反思与发展、超越与发展、转型与发展以及创新与发展四大范畴，分列四大编，算是本书菁华之所在，值得读者细读品味。这部分读者不但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有崭新的认识，还进一步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原本意义和整体形象。

之后，从学科融合（台湾称为“科际整合”）的视角、“财富主体”的视角、资本双重效应的视角和时空压缩的视角，作者采用世界史的眼光，来探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及如何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目前的成果，这应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务之急。这点显示了作者

序 言

的睿智。

至于中国社会结构之转型和发展之理论与实际，作者强调以人为本、改革既要人性化，也要发扬人本主义。这点正符合和响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倡导。这不是教条式马列主义者所抨击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温情主义，而是体现邓小平的基本理念：在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之同时，谋求人民群众最大的幸福与实惠，更是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编讨论社会心理和人的选择、社会管理（administration 似乎宜用社会处理 management；或社会治理 governance 为佳）、凝聚社会核心价值，同时熔冶融汇科学解释（德文 *Erklärung*，英文 interpretation）与人文理解（德文 *Verstehen*，英文 understanding）于一炉，而归结为繁荣哲学与社会科学，大胆倡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大作为”的主张，这算是全书的结尾，也是其精萃所在。

综观张教授此一新书稿，吾人发现其中内容充实、立论精致、叙述清晰、引用翔实，还首尾贯穿了作者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值得向海内外读者推荐，是为序。

台湾交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讲座教授 洪鍊德

2013 年 12 月 12 日于新竹十八尖山山麓寓所

目 录

序言	1
导论 多元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理论创新	1
一、研究范式：从“一元独尊”到“多元互竞”	1
二、表达范式：从“一种声音”到“百家争鸣”	7
三、思想范式：从“被动接受”到“自我主张”	12
四、在时代变迁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转换	18
第一编 反思与发展	20
一、重新认识马哲教科书哲学	20
二、重新认识辩证唯物主义	34
三、重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	44
四、重新认识实践唯物主义	66
五、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形象	76
第二编 超越与发展	84
一、马克思哲学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基于学科融合的视角	84

二、马克思能力财富观的当代启示：基于“财富主体性”的视角	96
三、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当代意蕴：基于资本双重效应的视角	105
四、马克思跨越生产关系思想的当代意蕴：基于时空压缩的视角	116
五、如何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基于范式转换的视角	121
第三编 转型与发展	130
一、三大转型与中国发展	130
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效应	141
三、以人为本与人性化辨正	150
四、改革开放与人性化进程	160
五、时代变迁与哲学转型	169
第四编 创新与发展	180
一、社会心理与人的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视角	181
二、结构性问题与社会管理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论域	191
三、整合与凝聚：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向度	200
四、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重思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	211
五、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更大作为	220
余论 在范式转换中实现理论创新：以全国“马克思哲学论坛”为例	224
参考文献	230
后记	239

导 论

多元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理论创新

诞生于 19 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1 世纪如何生存和怎样发展，既是摆在每一个关心和同情马克思及其理论命运的人们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如今，在时代变迁与范式转换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应当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努力方向。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步。随着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话语霸权”的式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元化格局日渐形成。如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我看来，在多元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键是范式转换。具体而言：研究范式从“一元独尊”到“多元互竞”；表达范式从“一种声音”到“百家争鸣”；思想范式从“被动接受”到“自我主张”。一般说来，“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是哲学研究中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前者主要从内容方面揭示研究视域问题，后者主要从形式方面直接关涉到研究范式问题，比较而言，后者更具决定意义。

一、研究范式：从“一元独尊”到“多元互竞”

任何哲学都是内容和形式具体而历史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也

不例外。诞生于 19 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还适用于 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改革与建设的新时代，以革命性和批判性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已经过时？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摆在我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哲学必然发生研究主题、研究重心、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和理论形态的转换。”^① 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在不同的著作中作过深刻阐述。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② 因而“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③。在此，恩格斯不仅指出了时代变迁对哲学形态的巨大影响，而且论及了时代的哲学对社会发展的积极的反作用。事实上，哲学革命和哲学创新实质上就是指“哲学范式”的转换和更替，而“哲学范式转换”实质上又是指哲学的“结构性变化”。

范式理论如今还具有解释力吗？自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这一核心概念以来，它便成为哲学、科学史乃至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如今“范式”几乎被运用到任何可能的领域。根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的研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对范式至少给出了二十一种不同的说法或定义：即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一个神话；一门“哲学”，或一族启迪智慧的问题；一本教科书，或经典著作；一个完整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为一种模式；一个科学成就；一个类比；一种成功的形而上学思辨；一个习惯上公认的方式；一种工具的来源；一种规范的解说；一个装置或仪器操作规范；一副反常的纸牌；一个工具制造

① 韩庆祥、张艳涛：《时代变迁与哲学范式转换：从革命的哲学到建设的哲学》，《北方论丛》2007 年第 1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8 页。

厂；一幅可以从两种角度观看的“格式塔”图形；一套政治制度；一种适应于准形而上学的“标准”；一个可以指引知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理；一个普遍的认识论观点；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某种定义广大实在领域的东西。库恩的范式观念，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从波兰尼的知识论中“支援意识”的观念衍发而来。“范式”（paradigm）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哲学的核心，也是一种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本质内容。^① 所谓“范式”，是指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其成员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传统，规定了共同的发展方向。其实，“‘范式’一词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②。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同行的认同。“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③ 因此，范式不是泛指某种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特指哲学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④ 哲学范式转换必然带来哲学主题、哲学方法、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核心理念

①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汉语学界用“范式”来研究人文社科领域的先驱是余英时先生，他在美国用范式理论阐释了近现代“红学”的发展，颇有新意。此后不断有人使用范式理论来阐述各学科的理论变迁。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311页。在此，本书旨在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考察时代变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之间的内在结构。

② [美] 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生、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

③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④ 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的转换。“范式”似乎和“信仰”内在相关，当某种研究成为多数人效法的对象时，我们往往称其为“范式”。“相对于理论结论或见解的变革而言，范式的变革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变革。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可以带动整个理论视域、理论形态的变革与创新。”^①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百家争鸣与多元对话的发展趋向。随着“双百”方针的深入人心，民主探索与理性争鸣的理论生态景观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逐渐生成。在此情况下，究竟哪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更契合马克思的本真精神？这需要时间、实践、人民和时代的长期检验，需要足够的“时空间距”。笔者以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上，“理论至上”与“理论虚无”这两种倾向是同样有害的。尽管就世界范围而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主要思想依然是具有批判潜能的，关键在于它是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命运的。在21世纪，重新阅读和深入理解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思想具有比以往更为重要而紧迫的意义。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人们有时会一再误读马克思，甚至一度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以致于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就曾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无疑需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深思。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它就必须对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有所回应，而不是“被边缘化”、“不在场”、“失语”或“自我放逐”。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首先是以一种“革命的学说”之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现实的个人必然处于资本与劳动、物与人、压迫与解放的张力之中。为此，马克思站在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立场上，一方面看到资本与物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与物对人的排斥（使人异化）。因此马克思所肯定的那种哲学不是从概念到概念逻辑推演式的“理论哲学”，而是关注人的发展命运的“实践哲学”。这种哲学作为一定历史时代的现实关系和特定

^① 任平：《探索研究范式创新哲学理论（代序）》，转引自柯锦华、任平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存在状态在思想上的“反射”和“回响”，必然要用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必然要通过思想传递时代的声音，必然要通过先进理念引领社会发展。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是要不断重新理解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不光要以理论去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更应自觉变革理论、发展理论、创新理论。只有以批判性的思维去对待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在批判思维中双向矫正理论和现实，才会有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之一就在于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分析、回答和解决。一旦深刻分析、合理回答和有效解决了时代性的重大现实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哲学自身也实现了与时俱进。当今中国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它内在地要求中国学者要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这无疑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与资本的逻辑的批判中出场的，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越深入，资本的作用越突出，物对人越排斥，就越需要哲学家的声音，就越需要挖掘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价值，也就越需要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此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高度关注“中国道路”所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源于西欧，主要经过俄国和日本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纯粹的学理来研讨，而是把其视为改变国家命运（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以及关注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的学说加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舞台上的崛起，是以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标志的。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的文化场，横向移入中国“文化场”的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重构过程。况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因经过了俄国这个特殊“文化场”的演绎和重构，因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变形”与“失真”。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呢？鉴于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更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需要，那时的人们

把唯物史观主要理解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把唯物辩证法主要理解为对现存秩序的合理变革，把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一思想主要理解为矛盾的斗争性。这些理解固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并未完整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特征和基本价值。“苏东”剧变和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以往的这种理解方式具有某种历史局限性。回顾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李大钊、毛泽东、冯契三个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典型地代表了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早期、中期和近期的成就，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历史联系”^①。如果说李大钊是 20 世纪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毛泽东则是 20 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冯契则是 20 世纪中国最系统化、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从本体论引向实践论，这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但实践论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就是只注重认识论、方法论，而不讲本体论，这会把哲学引向困境。因此，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就成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的致思取向，冯契的“智慧说”无疑就是这一思考的理论产物。“从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再到冯契的智慧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由中国哲学而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融会贯通、再进而由中国哲学的提问和传统来启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历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了双重的推进。”^② 这一历程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中虽然历经曲折，但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依然是当代中国人所要继续追寻和努力探索的道路之一。

① 参见王守常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0 页。

② 王守常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41 页。

在当代中国，邓小平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要按照人的方式，根据人的本性的需要来重新安排世界；社会主义是人的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开始；社会主义的一切形式都要服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价值）。可见，邓小平理论是以中国特色（其核心是“走自己的路”）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为基础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在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同时，谋求人民群众最大的幸福和实惠。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所提出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的新提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哲学基本价值在中国的回归之路的继续。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中国梦”思想，无疑是马克思哲学基本价值在中国不断深化、开拓创新的有力表现。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时下，建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价值体系，整合并凝聚各种价值取向，已成为时代的强音，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价值是相契合的，可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价值在中国的回归。这一成就的取得，一定程度上凝聚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思想贡献。

二、表达范式：从“一种声音”到“百家争鸣”

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与核心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正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在对以往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在研究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与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中，在对时代重大现实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关注中，才开辟出哲学新道路的。马克思哲学的诞生是哲学适应时代变革和人的转变的方向性变革，他使哲学视域、主题、思维方式、目标、胸怀和范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正是这些转换，显示了哲学的新气象和新特点，并以此奠定了现代哲学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为哲学开辟出

新的发展道路。这些根本性的、具有方向性且影响深远的转换大体可以概括为：哲学视域——从抽象思辨世界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哲学主题——在物的增殖与人的发展中马克思哲学更关注人类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哲学思维方式——由既成论思维转向生成论；哲学目标——动力目标与和谐目标的统一；研究胸怀——注重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盟；哲学范式——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可见，马克思通过对传统哲学观的变革，不仅开创了整个当代哲学，而且也实际影响、参与并主导了整个当代哲学的发展进程。马克思哲学是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它以对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关怀为己任，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回到马克思’，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初始理论地平”^①。所谓“回到马克思”，其中之一就是回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价值，追寻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同一面多棱镜，不同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视角发现其不同的哲学内容，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涌现出一批新生长点，如人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发展哲学、生存哲学、政治哲学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而鉴于“文本研究”、“比较研究”、“实践问题研究”以及“基础理论研究”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包括在其各自领域已形成的研究团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同学派正呼之欲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互动性的比较研究的聚焦点则是哲学观问题。”^②新时期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最终指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总的来说，当前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体有四条基本路径：其一是以

①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代译序第6页。

② 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